

社会学家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总第30辑 2009年第1辑

茶座

陈晓律、韦森、郭于华、曾念长

张荣明

汤 军

萧功秦

田方萌

焦玉良

聚焦：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社会

“知几”：历史中的另一种眼光

最性感的历史私处

思想的碰撞——2004台湾纪行（之一）

从门外看“后学”之一

从人肉搜索说起——信息社会的道德困境





朦胧

偶然在坊间看到《今天》30年的合订本,恍然忆起这本以倡导朦胧诗知名的纯文学杂志已经问世30年了。说起朦胧诗的问世,当年还曾在文化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今天的文学青年大约很难理解,为什么一种采用象征手法的诗艺风格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论。要知道此前诗坛上盛行的多是口号诗,其含义固然一目了然,可却因此丧失了诗歌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诗味”。英国诗人和批评家燕卜苏的成名作《朦胧的七种类型》说:“即使对原文没有误解也可能产生多种解释的情况下,便可称之为朦胧(ambiguity)。”他为“朦胧”给出了一个美学上的定义。其实只要稍稍浏览中外文学史,就不难了解“多义是诗歌的美德”。从古到今,那些千百年间流传不衰、脍炙人口的好诗,就风格言,多是朦胧的,所谓“楚雨含情皆有托”。

不仅是好的诗歌,就其他文学艺术作品说来大多也不外乎此,因为艺术必须与现实产生间距,才能给人带来美感。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在论及东方人的审美经验时说:“我们更喜欢沉稳带有阴翳的东西,而不喜欢轻佻鲜亮之物。”不管是天然玉石还是人造器皿,都喜欢它带有朦胧的光泽”,因此,“离开阴翳就谈不上什么美”。谷崎的这篇名作谈的是建筑和艺术的审美,其实就人类对于社会的认知而言,又何尝不然?

以现代人的后见之明;检视前代社会思想的作品,也许会觉得他们过于朦胧,缺乏现代社会科学所具有的明晰性,但我们可能忽略了,也许恰恰因为这种朦胧,反到了那些以往别人所未曾看见的东西。

现代人的社会观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的事。古代有位叫做九方皋的人,连马的公母毛色也分辨不清,然而他所相中的马却均非凡品。“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列子》)对于细节清晰的过度追求,有时反而妨碍了我们对于事物的整体把握。朦胧的好处,是可以让熟悉的事物再度陌生化。没有了关于细枝末节的清晰,反而能突破通常认识框架中被人们忽略与遮蔽的重要方面,让事物呈现出更具整体性的真实面目。

法国学者和作家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有句名言,就不仅仅是为文艺家立论的:“要想看得清楚,便要看得朦胧。”

古人所谓“知几其神”,其此之谓欤?

王 焱

2009年新春爆竹声中

目 录

卷首语 | FOREWORD

001 王 焱 朦胧

读者来信 | LETTERS

004 [杭州]徐迅雷：“应赛体育”与“举国体制” [武汉]刘洪波：我们的船需要修造 [长沙]石晶：山寨 2008：谁扯着大旗在撒谎？

随 笔 | ESSAYS

010 陈蓉霞 红字与纸手铐
013 海 青 “闲人”林黛玉
018 汤 军 最性感的历史私处
021 许章润 走马转心楼

聚 焦 | PERSPECTIVES

金融危机与中国社会

023 陈晓律 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导权
031 韦 森 减税富民，启动内需之本
041 郭于华 金融危机与我们的社会
047 曾念长 “官商传统”的盛世危机

世 相 | MASSES

055 张 闳 愤青的变迁
062 吴万伟编译 焦躁不安的年轻人
068 柳 珊 观察美国大选

学术圈 | ACADEMICAL CIRCLES

073 萧功秦 思想的碰撞——2004 台湾纪行(之一)
082 田方萌 从门外看“后学”之一
088 朱富强 警惕学术界的多数暴政——谈当下的学术评价机制

定价: 14.00 元

读者来信

Letters

“应赛体育”与“举国体制”

奥运开始了,奥运结束了。这是 2008 年 8 月的中国北京。中国体育代表团金牌总数第一。这并不出人意料。倒是闭幕式上的一个细节很出人意料,那是感人的一幕:一名荷兰运动员向女友求婚,并获成功,他俩抱成一团,其他队友则围成一圈,愉快地见证这一美好时刻。

这次是我们“自家门口”的奥运会,我国在主办赛会和赢取金牌两方面都赢了,这样的“双赢”,国人当然很满意。港澳台各大报刊评论说,中国金牌数“大步跃进”,写下完美句点,奥运会上出现中美领衔的新格局;这是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的结果,51 枚金和 100 枚奖牌反映的,是一个整体的质和量的进步……

仅就这次“竞技体育”而言,说“质和量”的“整体进步”,应该没错。可是从整个国家的体育状态看,恐怕只是“成功掐尖”而已。因为我们行进的是“举国体制”下的“应赛体育”。成功的“应赛体育”大批掐下最顶尖的金牌。中国教育是“应试教育”,中国体育是“应赛体育”,奥运会之后,这

两者几乎成为“双胞胎”了。

我国有长久施行的“应试教育”,已颇为著名。应试教育的本质很清楚: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考试,学校、老师、学生、家长,一切的一切,只为考出个好分数。“应赛体育”异曲同工:体育的目的是为了比赛,体育局、教练员、运动员、运动员的家庭,一切的一切,只为赛出个金牌来。拿到银牌、铜牌大抵属于失败,都要哭出声来。“应赛体育”的运动员就像学生,而“应试教育”的学生就像运动员。

这次北京奥运会,我们已向世界证明“举国体制”的强大、“应赛体育”的厉害。就像全世界在“应试教育”领域比不上我们一样,在“应赛体育”领域,全世界也都无法与我们匹敌。我们在考场和赛场上的“应试”水平和“应赛”能力,属于世界一流。北京奥运中国造,办奥运我们是举国体制,办体育我们更是举国体制,这就是倾国之力,当然比倾城之力来得巨大。举国应赛,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对夺金显然是有效的。

然而,就像“状元大国”并不是“教育强国”一样,“金牌大国”并不是“体育强国”,两者距离还很远。我国高度发达的

“应试教育”并没有培养出一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奥运金牌也不是体育界的“诺贝尔奖”。要说体育界的“诺贝尔奖”，那一定是全民体育进入世界最先进行列。真正分量最重的“最后一块金牌”，一定是全民健身。

综观世界，如今依然走在“应赛体育”路上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体育江河日下，而是一种正常回归，他们的全民体育世界一流。比如加拿大就与“举国”无关，他们看起来可怜，只拿到3金，在金牌榜上名列第19位；回想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作为东道主的加拿大，竟然一枚金牌也未得——可他们长期以来都是世界著名的全民体育大国，令世界称羨。

我们的“应赛体育”，对个人来说其实是一种无奈。因为“金牌”是运动员的“饭碗”，他们要靠这个来吃饭、来生存。不像发达国家，运动员大多有自己的正职，有稳定的职业收入，失业了也有基本生活保障。靠金牌吃饭，如同学生靠分数吃饭。由此，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一些运动员拿到银牌铜牌也要哭鼻子，这跟学生考试考砸了哭鼻子是一样的。参与比赛，本是参与游戏，欢笑与泪水都很正常，但只有摘金才欢笑，其他全都是泪水，就不那么正常了——这背后是体制性的非正常。而那闭幕式上的荷兰运动员，正因为竞技体育不属于“饭碗”意义，所以奥运盛会才给他们带来游戏和派对的轻松与浪漫。

我们有位教练说：拿金牌，不是靠拼搏，而是靠拼命。这是沉重的代价。“应赛体育”与“应试教育”一样，是最容易导致心态的变态的。古今中外，无论应试应赛，这种“变态”常有所见。比如过去的“范进中举”，比如有现在高中生一听到“高考”二字就发抖。北京奥运会跆拳道男子80公斤以上级铜牌争夺赛中，古巴选手马托斯因为不满裁判的判决，飞起一脚踢向裁判，被终身禁赛——这老兄反奥运精神而行之，也是“应赛体育”给害的。

也并不是所有体育项目依靠“应赛体育”都能靠得住。我国的足球，是典型的“应赛足球”，一切都为奥运足球赛而安排设置，结果却还是输得很惨，激起民愤无数，还出现了“鸟巢民主”：几万名观众在“鸟巢”里齐喊“谢亚龙下课”。“叉腰肌”的中国足协主席谢亚龙，他领导的中国足球，深陷“应赛体育”的迷津而无法自拔，令每一个关心它的人愤怒而绝望。无能的谢主席其实也很无奈，“应赛体育”就像高考，可能上线，也完全可能落榜。收入颇高、养尊处优的中国男足队员，名落孙山是一点也不必奇怪的。

“应赛体育”能得金牌，但难以培养出伟大的运动员。在北京奥运赛场上，人们将永远记住两位最伟大的运动员：飞在水中的菲尔普斯和飞在地上的博尔特。一个人夺8块金牌、破7项世界纪录——菲尔普斯这个23岁的“水怪”在水立方完成的伟绩，被美国媒体一语双关地评价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博尔特则是3块金牌、3



破世界纪录。“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欣然’而泣下”——这只能属于菲尔普斯、博尔特,但他们都不是“中国造”。

竞技体育成为一种饭碗不是不可以,但其本质应该是对公众体育、全民健身的示范与带动。但如果局限于“应赛”,为金牌而金牌,那么全民健身就是镜花水月。我国政府一年只有8亿元的体育投入,人均还不到1元,实在是比较可怜的,这点钱除了体育行政系统的经费开支外,主要用在竞技体育上也不奇怪。全民健身,除了个人投入外,更需要国家的大投入。比如公共体育设施,若无政府投入建设,那么人均体育设施面积永远将排在世界三四流。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样的“老话”并没有过时。调查表明:不少民众体育健身意识薄弱,国民体质堪忧。更可怕的是,在“应试教育”和“应赛体育”的双重效应下,我国的学生成为双重的牺牲品:“应试教育”在摧残学生们的身体,“应赛体育”则对提高学生体质帮不上忙。多年的监测表明,我国学生的身体素质每况愈下;如今的中学生,别说保证他们每天1小时的锻炼,就连法律规定的睡眠时间都不能保证。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同一个梦想”绝不是“只拿金牌”。“让世界了解中国”不能只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举国体制”“应赛体育”夺金牌很厉害;“让中国走

向世界”,更不能是固守自己的“应赛体育”去与世界“接轨”。17天奥运,难以忘却的记忆。若用北京奥运会金牌的“金镶玉”作比,那么全民健身应该是“金”,竞技体育才是镶嵌其身的“玉”,而不是倒过来。我们的体育,就应该具有这样的金玉品质。

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考场上,体育不能只停留在赛场上!

[杭州]徐迅雷

我们的船需要修造

温州市常委、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在任上出国考察不归,这一事件并未随着浙江省纪委的“双开”决定而走出公众关注的视野。11月28日,该省领导做客人民网时,杨湘洪事件再度被网友提及,该省领导的回答也于次日被媒体广泛报道。省领导说,省委、温州市委对杨湘洪仁至义尽,他最终没回来。各级组织对于一个干部,不论是有了错误,还是出于关心、爱护,都希望他能够回归祖国来解决问题。处在这种情况下,还执迷不悟,滞留不归,这是党纪、政纪所不允许的。他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有问题,别看开除了他的党籍和政籍,但是还需要再去追查的。

杨湘洪如果存在其他问题,还会继续追查。这个态度应该能够得到人们的肯定。不过,对一个出走官员“仁至义尽”的做法,要获得人们的理解,恐怕不是容易的事情。官员出国,事务无论公私,不得逾期不归。出现这种情况,责令返国并给予

相应处罚,这大概是人们的普遍认识。“仁至义尽”并非官员管理的规章,“劝返”并非一个法定程序,坚持执行仁至义尽的劝返,一般人何以理解此中心曲?

据说“劝返”也有成功的例子。2008年11月13日,《国际先驱导报》报道,11月初,上海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接受劝说悄然返国;2007年2月,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胡星在警方心理攻势下从新加坡回国;2008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于兵由最高检从南非“劝返”回国接受调查。2008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劝返外逃贪官7人。报道称“劝返模式初见成效”。劝返方式主要是如果没有掌握犯罪事实,承诺回来后可以继续担任原来职务,或者调任相应职务,仅作批评,不作处分;如果掌握了犯罪事实,就从减轻处罚角度劝返。

我想,不管是用于官员滞留不归还是用于官员腐败潜逃,劝返大概都可以体现仁至义尽,但是否足以体现纪律或法律的严肃,则是一个问题。处理结果会跟跑掉或者不跑掉挂钩,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事情。无论滞留不归还是腐败潜逃,都是官员的“弃船”行为。用劝返了几个人来说明劝返模式“初见成效”,但为何不用更多的人一去不返来说明劝返模式事倍功半,甚至基本劳而无功?

需要正视的是官员“弃船”行为何以越来越多发,这不是用管好护照来解决的问题。“弃船”行为的发生,可以表明官员对于他所弃的船的真实看法。这种真实看

法,不能用他们在船上时的公开发言来代表,而只能用他们为弃船所作的准备来证明。他们对船的看法,以及他们对船的运用法,表明了船的实际状况。

一条船会成为其舵手、船员的弃物,而在此之前,他们对船上乘客显示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态度,这固然说明了舵手和船员的人格,但可能尤其表明了修船的必要性,因为船只已经连舵手和船员也不相信,不仅随时准备抛弃,而且随时为抛弃做着准备。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能用对杨湘洪、杨明珠等弃船者的讨伐来掩饰的。

近来,又一个消息在迅速传播,一网友在上海地铁站拾到两张公务出国考察消费票据,分别来自江西新余和浙江温州。这两个团组由旅行社组织出国,一个去考察人力资源管理,一个去考察美国政府行政管理经验。花的钱不算少,两个团差不多就是100万元。这样的票据,看到了让人想哭。

我不知美国政府行政管理如何,人力资源管理又如何,但似乎没有听到过官员出国滞留不归,也没听到过官员腐败潜逃。至于每个地方都有官员花费巨款,以考察“先进经验”的名目去作国际旅行,那简直是有一个就得下台一个,有两个就得下台一双。这样的丑闻,全世界有几个国家会搞得不像是丑闻,而是“各地都有这样的公务考察团”呢?

没有人滞留不归,这是要庆贺一下的。大多数这样的团组都没有人滞留不归,这大概是更要庆贺一下的。经常听到



人们讲优越性,我想这些官员们必然最有资格,他们能够知道做一个官在哪里是最舒服的,做一个民在哪里是最愉快的。出国考察归来了,还可以期待“下次再来”,有这样来去方便的条件,回来实在是很幸福。如果财发得够了,钱攒得多了,那么把子孙后代弄到国外去,或者把自己也连带打包出去,当然也很有必要。

请认真地想一想,这都是怎样才会出现的?弃船者远走高飞,未弃船者在送子女到达彼岸,或者在构筑“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金钱或者权力基础,而与此同时,他们在赞美着国家的可爱,歌颂着制度的优秀,呼唤着人们奉献的热情。

某种程度上,我会把弃船而去的官员与一直未曾稍减的移民热、出国热作为同类现象,虽然这两种现象看起来在道德性和合法性上有着很大差异。在这个选择成为正当权利的时代,我尊重所有人选择生活的权利,行之合法,我甚至可以同意,选择的通过代表人生的成功。然而,当成功者与罪恶者都在做着同样四散而出的选择时,你又作何感想?那些考察后如期回国的官员们“下次再来”的豪情,是否让你感到问题之所在?

[武汉]刘洪波

山寨 2008:谁扯着大旗在撒谎?

站在岁末年初的关口回望过去的2008,针对“山寨”存留去从的争论是一场绕不开的大事件。而随着岁末时央视和凤凰等一系列主流媒体的加盟,这场存留论

争的主题便由产品上升到了文化,论争主体分化出了草根平民和传统精英两大阵营,论争形式则日益凸显出阶层特征。

山寨的支持方自称“草根族”,十分狡猾地拉上“平民文化”的旗子,这在人权意识日益觉醒、精英文化逐渐消解的今日中国,自然很容易触发某些群体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进而争取和笼络一大批跟随者。草根族说:“山寨文化是带有颠覆与挑战性质的平民文化”,“是草根大众对正统社会和上流阶层的批判和思考”,“是后现代的平民起义”。我们在此无须推敲这些命题表述形式的宏大无当和逻辑欠缺,因为各式各样的山寨产物自身早就已经证实了这种说法的非合理性:山寨手机是对曾经的成功人士拥有物“手机”的模仿,山寨数码相机是对曾作为时尚标志的“数码相机”的模仿,山寨春晚是对权威象征物“春晚”的模仿,而山寨百家讲坛也不过是对传统精英文化代言“百家讲坛”的模仿——从手机到数码相机、从春晚到百家讲坛,铺天盖地的山寨产品和汹涌恣肆的山寨现象中,我们没有看到所谓的挑战、所谓的颠覆、所谓的批判和思考,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模仿,是草根阶层对精英阶层及其所有物的仿效和追随。如果一定要说改变,那么最大的、而且可以称之为进步的改变应该是草根阶层的社会服从方式——由于对财富和平等的急剧化追求,草根们将对精英事物的认可方式由原来的被动性渐进式接受转变成现在的主动性他谄式模仿,山寨手机是如此,山寨春

晚更是如此。于是,当这些山寨产物无关乎颠覆和挑战,山寨现象并未有批判和思考,那么山寨文化也就失去了现象学上的意义支撑。所谓代表了平民精神的文化大旗,则不过是一个空壳定义,成为侵权逃税大军急于混淆视听以合法兴师、趁机捞取非法利益并最终将自我跻身精英的幌子。

然而,当反对之声以一种很不周全的态度,浅薄而有失公正地将“山寨”谩骂为“流氓”时,我们对山寨的反对方——传统精英阶层就不应当再心存幻想。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盗版微软在中国的使用者从来就不是只限于草根族。精英阶层们高举着“知识产权”的大旗呐喊鼓吹,真正关心的却并不是知识产权本身,而是因为这场肆无忌惮的中国式山寨动摇了精英阶层的心理基础——中国传统的钟鸣鼎盛之家,其先进性器物或奢侈品的享用往往十分昂贵,富贵家庭的一口洋钟足以抵掉平常人家十来年的口粮或者普通百姓几辈子的收入。这种对高级物质的占有和享受给予了精英阶层的一种源自于财富的骄傲和自我优越。而我国长期以来的集权式统治方式又使得精英与草根双方都形成了这样一种意识,即财富和奢华能赋予拥有者以人格上的价值或内在的显贵特征。这种意识传承数千年,却在今日,随着山寨产品的出现而开始动摇——山寨产

品将所有高科技囊括其中,其价格却低廉无比,以至于原来只有精英阶层通过高额支付才能享受到的先进和品位,草根大众,人人都只需要付出很少的钱就能将其拥有,这让草根阶层对于这些享受产生出一种不以为然的情绪,并渐渐忽视其存在。草根阶层的这种自由和态度将精英阶层的自我优越意识向下拉拽,动摇了精英阶层赖以存在的心理基础,并日渐侵蚀了双方共同认可的人格价值与显贵特征。而这,恰恰构成了传统精英对山寨系列产物表现出冲天怒气的真正原因。

所以,山寨的支持声并不意味着草根文化的觉醒与颠覆,倒有可能是某些心系上流之徒意欲大捞晋身资本而放出的浑水和烟雾;山寨的反对声也并不就证明了精英阶层的道德和责任,而可能源自于对某些既得利益的维护。

那么,如果山寨并不像草根们所标榜的那样是“平民文化”的代表,也并不像精英阶层所指责的那样是草根阶层道德败坏的结果,而仅仅只是不可避免的阶层产物,透过这场论争,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当文化和法律沦为利益争夺工具,揭掉双方论争中的道德性批判与合理性指责,我们看到的是对社会生态良性反思的缺失,是上层建筑的堕落和悲凉。

[长沙]石晶



红字与纸手铐

陈蓉霞

发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学生杀师案令人震惊。震惊的不仅是作案者的行凶理由,只因为其女友与被害者曾有过性关系;更令人震惊的还在于网民的反响。在某一网站上,大多数网民对于作案者坦诚的行凶动机表示理解甚至支持,几乎所有网民以为行凶者干的正是为民除害的事情。当然,这样的网民意见绝不代表生活中大多数人的看法。是非公道,各人心中自有一杆秤。不要说放在如今的文明社会,就算放在更为保守的体系中来判断,谋杀女友的前“情人”,都是令人发指的行为。然而,少数偏激的网民却为此而喝彩,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从何而来?

不得不承认,大学教授这一体面的职业、优越的身份,似乎是惹来网民仇视情绪的起因,一个本该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怎能做出这种下三烂的丑事?这就是中国式的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弱者总是容易博取大众的同情,而精英则不幸沦为仇视的对象。但抛开这层原因不谈,从中还可看到的或许正是我们对人心深处的罪性或罪孽的意识相当薄弱。

近来正在上演的《梅兰芳》,让我们知道原来清朝还有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种刑罚方式:给犯人带上纸手铐,但挣脱的后果则是引来更严重的惩罚。这种处罚方式的残忍,不在于对躯体的摧残,而在于对心灵的施暴和蹂躏,在某种意义上,其影响程度甚至超过金属手铐。

无独有偶,纸手铐的情节,让人想起美国作家霍桑的作品《红字》。小说的女主角海丝特因为犯下通奸罪而受处罚,处罚的方式就是在胸前佩戴红色字母A,意为英文“通奸”的第一个字母。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小说的背景是在美国的殖民初期,当时清教徒的势力相当强大,而清教对于任何个人享乐,更不用说

陈蓉霞:上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

男女私情,极其反感甚至憎恶。但即便在这样的民意之下,对于海丝特的处罚却仅是象征意义上的佩戴红字,而非实质意义上的躯体摧残甚至剥夺生命。

就此而言,胸前佩戴的红字似乎与纸手铐有着某种类似之处,即它们都是对犯人的心灵冒犯,更具象征意义,而非实质侵犯。但细究起来,深层的意义却完全不同。犯人若是挣脱纸手铐,得到的将是更严重的实质性惩罚,在此威慑之下,纸手铐的束缚丝毫不亚于金属手铐。然而,佩戴在胸前的红字却很容易摆脱。只要乘船离开美洲,重回欧洲家乡,就没人知道你身上曾经有过的红字故事;甚至也不用远渡重洋,只要离开这个熟悉的小镇,美洲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重新接纳你,而不问你的过去。毕竟这是拓荒时期的美国,由于地理的阻隔,信息的交流要远比今日闭塞得多。数年后,海丝特确实建议她的情人——牧师丁斯梅尔代先生一起乘船离开此地回欧洲,甚至连船票都搞定了。

然而,当初的海丝特没有通过此种方式逃避处罚,尽管由于海丝特的忍辱负重、敬业勤勉,红字的含义已从当初的“通奸”转义成后来的能干(able)甚至天使(angel)。丁斯梅尔代先生最终的选择也不是离开此地,恰恰相反,当众坦承自己就是那个不为人所知的共犯,在完成这番忏悔之后,死在海丝特的怀里。至于海丝特,多年之后,她却回到小镇,回到这块曾经收获爱情、也曾经留下屈辱的土地。并且,她的胸前依然佩戴着红字,完全出于自愿。

作者霍桑通过作品所要强调的一个意思就是,其实人人胸前都佩戴着红字,亦即人人内心都有罪性的存在。尽管海丝特出于坚贞的爱情,没有当众说出她的情人、牧师丁斯梅尔代先生的名字。但烙在牧师心口那个不可见的红字,施加于他的折磨更是远甚于海丝特胸口那有形的红字。这就是说,罪孽感来自于内心,而非外界舆论或强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红字与纸手铐的象征意义截然不同。就红字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佩戴者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自愿的行为,他(她)可以选择逃离;但就纸手铐而言,对犯人来说却完全是一种强制行为,他很容易挣脱这层薄薄的纸,却不可能逃脱官吏更严重的惩罚。在强大的外界压力面前,他毫无选择可言。

在某种意义上,借用本尼迪克特的话来说,这也正是东方的耻辱感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的区别所在。羞耻感的形成,必须要有第三者(或外界舆论)的在场,哪怕半夜醒来,想起某事羞愧得难以自容,但它依然相对他者而言;然而,



罪孽感却相对上帝而言,或者相对于自己的良心而言,它无须第三者的在场,完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省,或者说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惩戒。

这就说到《新约》里面那个著名的故事。有一个妇人行淫被当众抓住,根据当时的习俗,她受到的惩罚可能是被众人用石头活活砸死。正当围观的众人纷纷举起手中的石头时,耶稣走了过来,他说,只有那些从未有过罪孽念头的人方可扔出手中的石头。闻听此言,众人手中拿的石头纷纷落地,人群自然散去。这一故事意味深长。这里所谓的罪,指的是人心深处难以避免的各种私心、自负、贪欲等等。就此而言,谁又能说自己与罪孽丝毫沾不上边?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此言诚然!

回到本文开头所讲的杀师案引出的少数网民的偏激心态。正如耶稣所言,只有那些心中从未有过罪孽念头的人,方可向道德低下甚至败坏者施行口诛笔伐(至于人身攻击则为现代法律所禁止)。如此说来,社会的道德风气是否会日趋败坏甚至堕落?当然不会。首先,那些敢于对道德低下者进行口诛笔伐的人们,他们自然能够分辨是非优劣,这就意味着,他们才是不会犯下过错的正人君子,有这样一个阵营的存在,还怕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只是他们的当务之急不是到处讨伐别人,而是以身作则,为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要知道,道德首先是一种身体力行,而非自我标榜。道德的力量就在于,它只可用来律己而非绳人。其次,其实也是更迫在眉睫的事情就在于,营造一种制度环境,使得那些道德低下者不可能占据要位、高位。在此需要补充的是,如今网上得益于网民揭露的不少腐败案件,当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因为它们早已触及法律底线,是一种刑事意义上的犯罪,而非道德意义上的罪孽。

其实这样的智慧在中国同样存在。我们的国学大师孔子早就阐述过“恕”的真谛: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只是不知何故,尽管如今国学大热,但恕道却依然未能深入人心。以至不少人对于烙在自己内心深处的红字视而不见,却专门针对别人胸口的红字任意施骂。长此以往,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不得不受到纸手铐的束缚,但是这样的一副纸手铐,除了对人的心灵施行阉割外,难道还能指望它培育出一种人格健全的国民个性?

“闲人”林黛玉

海 青

在与《红楼梦》相关的诸多话题之中，最没结果偏又长久不衰的，大概要数钗黛之争了。名著人物鲜活，常常各有粉丝，虽然早有红学家提出曹公笔下之钗黛关系，并不像后四十回续书中那样你死我活，黛玉之死并非宝钗横刀夺爱的结果，连脂批也透露着“钗黛合一”的意思，无奈粉丝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就是排外，拥钗派与拥黛派搞出来的演义，有时比小说还紧张刺激。

其实那些钗黛情结特别顽固的经常是女性，只因少有女性没有想象过自己是某部言情小说之主角的，那么做宝钗还是做黛玉，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了；至于男人们，可能怀“兼美”之欲者更多，现今网络上动辄看到娶妻当如某某，谈情当如卿卿，交友当如谁人的句式，大概再接下去，还会有包二奶当如哪位，一夜情当如哪位之类了。有道是响水不开，做“多情公子”固然令人向往，但呼声越大，可能越说明现实生活中情感匮乏的病症。今天社会中的人们看似更自由，拥有更多隐私，实际上，物质时代给一切情感都打上了消费印记，谈不起恋爱，结不起婚，更生不起孩子，是很多人面对的处境，更不用说婚后想尝尝红杏出墙的滋味要付出的高昂代价了。

千古钗黛公案，处处渗透着平凡生活中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之间的矛盾。王蒙曾总结“钗黛二元论”——“读小说自喜黛玉，实际生活中宁喜宝钗；搞恋爱自盼黛玉，讨老婆还须宝钗；掉眼泪自为黛玉，鼓掌喝彩还向宝钗”。其实生活中的钗黛价值早已混沌，难分“一元”还是“二元”，相美相亲者有时，相争相忌有时，相占领相戕害者也有时，但更多的时候，守卫着生活秩序的总是宝钗，黛玉则两处茫茫都不见。黛消钗长，是不谬的生活法则，只因黛玉身上承载着太多今人支付不起的价值，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大概是“闲”。

海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胡适看《红楼梦》，早有“两个世界”的观点。换个角度，大概也可以说，在《红楼梦》中，有一个世界是忙的，另一个世界是闲的。十二钗中最忙的要数凤姐，“机关算尽”忙着持家、尽孝、谋财、害命，忙坏了身体自己没法生育了，还要忙着别让婢女外室怀上丈夫的子嗣。李纨孀居，槁木死灰，应该清闲很多，但不用相夫，却要忙着教子，自己的青春与生命价值全部转嫁到第二代身上，若在今天，难保不是一个强迫症的病例。宝钗以博识出名，诗词曲谱、绘画调色、医药养生无所不通，知识总是要一点一滴劳心费力积累的，更费心的是世故圆融、人情练达，还要做知心大姐，对大观园中女孩们的情感动向生活问题细致观察，不厌其烦。湘云娇憨率性，日子应过得比较洒脱，奈何父母双亡，无人“娇养”，叔婶为了节省用度，家中连做针线的人都不雇，让颇具男儿心性的湘云整日做女红，能不“累得很”？至于宝玉，更是“无事忙”，脂批称他误在“多事”，“多”的当然不是“世事”，而是“情事”，宝玉不喜“经济学问”，每天忙什么？今天陪陪这个，明天探视那个，帮这个做胭脂膏子，给那个留一碟点心，大观园里“好姐姐”“好妹妹”这么多，够宝二爷忙了。

相比之下，黛玉却是个“闲人”。如果闲也有血统的话，黛玉则是天生的“闲人”——绛珠草本生于西方灵河岸，修成女体后，“终日游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在五内便



贾宝玉情不情，林黛玉情情

郁结成一段缠绵不舒之意”。佛祖脚下，本来无生无灭，没有世间烦恼，绛珠仙子下凡还泪，以至“勾出多少风流冤家”，近乎一种精神自娱，说得粗俗些——没事闲的。

仙子的自由意志降到凡间女孩林黛玉身上，成就了哀婉凄恻的个人宿命。黛玉既为“情情”，更以恋爱为本职，闲是一个基本前提。她客居贾府，虽有寄人

篱下之怨，却无须操心实在事务，进府伊始，就一门心思都扑在自己的前世冤家身上。“每日家情思睡昏昏”，闲才能怀春，才能猜忌口角，生出诸种情事，也只有“镇日无心镇日闲”的人才能更关注自己的精神空间，才有这么多眼泪来“暗洒闲抛”。可以说在《红楼梦》中，黛玉最凸现了中国文人易感闲愁的特质，“闲”本来是对时间的奢侈挥霍，反从中生出独特的时间感，在放纵时间流逝的过程中感怀青春短暂、光阴不返，堪称一道奇异的精神景观。红楼中人每每多情，各有各动情的方式：宝玉一动情，便要“做和尚”，或是要与红颜知己们一起“化灰化烟”；宝钗动情至极则“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只有黛玉有那种“心动神摇”、“如醉如痴”、“神魂驰荡”、“余意缠绵”、“又喜又惊”、“又悲又叹”的情感体验，以至“浑身火热，面上作烧”的身体表征，因闲人才有可能将感情全部投入，并将自我遨游其中，抛除利害计较，获得极度震撼的心灵感受。难怪书中交代“病由此萌起”，如此的精神饕餮，常人如何消费得起！

世人对“闲人”的恐惧嫌恶也由此而起。《红楼梦》开篇，称神瑛下凡是“乘此昌明太平朝世”，太平盛世是该闲还是该忙呢？黛玉写过颂圣的句子：“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让人人都清闲自在，应该是一种非常古典的盛世理想。只是三代以后，理想不再，“闲人”失去了道德上的合法性，有德有才者都认识到须证明自身价值才不枉来人世一遭。在官本位的社会中文人何以自证？只有投靠体制一途。对这个问题，孔子的处理方式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中有大量篇幅讨论天下“有道”如何，“无道”又如何：“有道”则知，则见，则仕；“无道”则愚，则隐，则可卷而怀之……总之，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的那种紧张心境，用大白话说，邦有道就做忙人，邦无道就做闲人。

这条法则虽是真理，无奈拿到现实中全不顶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诚然，不管是世代还是自我，哪轮得到文人去“判断”呢？如果一个世代真能宽容人们去隐、去闲，恐怕就不能算无道，反而是大大的有道了。所以，中国文人发牢骚，每多自嘲自贬、自甘“废物”之词，少有直指时非的，如杜牧诗云“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不想放弃“有味”的追求，当然只能自任“无能”，世代永远是清明盛世，对那些无视它的存在而一心关注内在自我世界的闲人，总是白眼相向。

闲人中自有贤与不肖，前者总是微乎其微，时人眼中的闲人，更多时候是那

些破坏和谐、造成不安定因素的惹祸根苗。在另一部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天庭对孙悟空务要招安封官,只因不能容忍下界一个修成仙的猴子悠游于秩序之外。猴子在天界当了只有头衔没有实务的“齐天大圣”之后,着实开心自在了一段时间,每日吃饱喝足,四处串联交游。结果闲人造成的威胁很快就被神仙们觉察了,“今有齐天大圣日日无事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俱称朋友。恐后闲中生事。不若与他一件事管,庶免别生事端”。这才有了让猴子管桃园的荒诞安排。直到后来悟空谋上取经的差事,他的闲人生涯和各种潜伏危险才算告一段落。这孙猴子即使在今天怕也命该如此。任何一个单位中,其实都少不了那么一批有衔无事的闲人,“闲”并不是问题,只是一旦被发现你在惬意地享受自己的“闲”,麻烦就会接踵而至,那些有权折磨你的人很快就要上门了。

“闲”也构成了黛玉最大的困境。下凡的仙子再也没有了仙界的洒脱,既忧“一朝春尽红颜老”,更虑“嫁与东风春不管”,在金玉良缘的威慑下,更是事事不能“放心”。黛玉讽宝钗“惟有这些人戴的东西上越发留心”,其实她自己之留心,比宝钗只有更甚。“金玉”一说尘埃未定,又出了个金麒麟事件,书中描写黛玉心理:

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鸳鸯,或有凤凰,或玉环金佩,或鲛帕鸾绦,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今忽见宝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见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

呜呼!老祖宗尚能批谎,黛玉却深陷才子佳人的陈腐旧套中解脱不得,如此看不开的仙子,世所罕有。到后四十回书中,黛玉更加“闲”不起来,年龄的增长使出嫁成了第一要务,简直变得神经质,嫁不成宝玉宁可寻死,哪里还有半点仙子气派,连个矜持的女儿家都说不上,一派怨妇态度。莫怪续书诋毁仙子,仙子变怨妇这一想法之生命力与深入人心,看看政治运动中对《红楼梦》的解读以及历次影视作品对黛玉之死的处理就知道了。

其实,对人间黛玉的处境,曹公未必没有心理预期。那个在情感世界中自娱、自足的闲人黛玉,千古一人,与世俗不妥协、不同化,只剩毁灭一途,按照惯例,在灭绝之前还要被冠以污名。黛玉看事之通透,言辞之尖刻,这些特性在庸众面前更容易引来的是恐惧和疏远,而不是爱慕。《红楼梦》很少实写作为仙子